

新时代的内在阐释^{〔*〕}

○ 张建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后物欲时代,是一个大数据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要矛盾根本转变的时代。在新时代,要解决今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需要顺应当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以大数据互联网为基础和平台,积极推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与大数据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生产与消费一体化;借助于大数据互联网,推动正义、公平、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新时代;后物欲时代;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9.002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党中央对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判断对指导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方略谋断、政策制定、制度安排等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它的科学依据、深层内涵应该如何理解?它对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提出了哪些更深层次的要求和规定?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张建云,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阶段性成果。

一、这是个后物欲时代

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并不是仅仅经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而突然出现的时代,它是我们的前代人、我们的祖先乃至人类有史以来持续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是建立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达到了质的飞跃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质的飞跃表现在人类仅仅为满足物欲的生产走到了尽头,人类生产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后物欲时代”^[1]。

人之所以有物欲,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人生而具有吃、喝等本能欲求、生理需要,而满足需要的对象却不在人自身,而在人的身外世界。人为了活着,必须不断地从外界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但是自然界的现成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人需要不停地劳动创造。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永恒矛盾。在人的各种自然需要中,“吃”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首先要满足的需要,农业生产劳动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具有基础性、其他产业无法替代的地位。“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2]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食物、衣物等物质产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直处于匮乏状态。特别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历史上也总是被吃饭问题所苦苦困扰。摆脱生存危机、解决温饱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祈梦。“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努力奋斗”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的主导价值观和基本的生活信念,一直激励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普遍应用,更使人类生产力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成倍增加,长期困扰人类的温饱问题终于从总体上得到了基本解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进一步下降至约7亿,贫困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继续下降至9.6%。^[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建设举世瞩目,成就辉煌,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减贫工作成就卓越。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尽管当前全球减贫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世界贫困人口还很多;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一些地区,还有不少人在为衣食发愁。对此,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我国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为扶贫问题、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而做出巨大努力,贫困地区也一年一个新变化,不断摆脱贫困、向小康迈进。因此,可以确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消除饥饿,消灭赤贫,彻底解决人类温饱问题并不是遥远的梦想,而

是正在变成现实。

总之,在过去 30 多年,我们见证了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这个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即不但全球摆脱贫困人口比例迅速下降,而且脱贫人口的绝对数量大幅度减少。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则亲身经历了“吃饭”怎样从困扰我们父辈的“困难问题”变成现今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的“不是问题”。人类有 90% 以上的人口、中国有 96% 以上的人口不再被温饱问题所困扰,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使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温饱难题,不用再为吃饭问题而拼尽全力,社会总体上不用再为生存问题而担忧。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后物欲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正处于“未来发展向何去”的十字路口。

新时代是一个后物欲时代。后物欲时代的来临说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终于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人类在总体上无须把时间、精力和才华都花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人类在食物等物质产品的供给上不再像动物那样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界。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获得的自由为人类从整体上从事科学、艺术、审美等精神生产创造了条件,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必须的物质基础。

新时代——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人的幸福已经不能单纯靠物质财富的增加来获得,物欲满足带给人的快乐越来越有限。由此,以往的建立在物质匮乏基础上的全部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管理理念、制度设计等等,都必须随之更新换代。那些单纯以满足人的物欲为目标的生产,那些单纯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目标的规划,那些以为有了钱就能实现人生幸福的价值观,都注定要失败。后物欲时代并不是人们没有了物欲,不是物质生产不再重要,而是物质生产的艺术创造,是以美的形式的实现。

二、这是个生产力质的飞跃的大数据互联网时代

生产力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体现人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种物质力量。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力的内在矛盾即人对满足需要的追求与自然界的现成产品不能直接满足需要而形成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促进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生产力的性质取决于物质技术性质,劳动资料特

别是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尺。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17、18世纪大机器的普遍应用，使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而20世纪上半叶电的普遍应用，使资本主义形成了世界体系。因此，要研究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首先最根本的是要研究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而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状况，就必须研究决定生产力状况的物质技术的性质，研究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状况。

当今时代，没有哪项科技成果比互联网更能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度普及，互联网日益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和平台。万物互联、信息互通，互联网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正如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可以说，世界因互联网而更丰富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

信息是大数据互联网的核心内容。什么是信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个定义富有深意。信息不同于物质、能量。人们之间物物交换，彼此获得的还是一个物，而信息与信息交换，彼此都将获得一个新信息，因为我们会将对方思想中有价值的因素融合进自己的思想中而进行新的信息构建。物质、能量越分享价值越少，而信息越共享越会增加价值。这在传统的小数据时代显示不出其重要性，但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共享就变得非同寻常了。

实践是人的自觉的有目的活动，人对事物、对象的认识以及相关信息的掌握对保证人的活动成功至关重要。传统时代，信息主要是靠“纸”等为介质进行传播。电发明后，人们以电为介质作为传输信号，实现了信息的数字化。信息的数字化促进了海量、多样化信息的实时获取、广泛流动、全民共享和便捷使用。大数据互联网打破了信息生产、交流的一切鸿沟壁垒，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伟大时代。

新时代是一个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物能文明的信息文明时代。在这个基于大数据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通过信息来组织、协调、控制物质和能量，从而使物质通过结构调整、功能改善更加满足人们的需要；使能量从难以利用的形态变成更容易获得和利用的形态，在全社会或全人类意义上实现“物为人役”，由此人的活动将越来越直接与信息打交道，而不是直接与物质、能量打交道。

大数据互联网新时代是一个共享时代。信息共享是信息文明的本质要求，

新时代要求在一切实公共领域尽可能地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促进信息的自由获取,自由存储、传播和交流,这是信息文明发展的内在的、根本的要求。凡是为了自身眼前利益而排他性地“拥有”信息,把信息作为一种独享资源,并作为一种权力的个人、企业或单位组织,都必将因忤逆时代趋势而被淘汰。

大数据互联网新时代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单位组织越是开放,与外界的连接点越多,机会就越多,创造空间就越大,发展前景也就越广阔。因此,新时代要求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要深度融入大数据互联网,这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形态。

大数据互联网新时代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互联网为个人学习创造了一切可能,只要有兴趣,每个人都可以在各个领域中挖掘潜能;同时互联网也为个人才能的发挥和自由创造提供了机会。新时代,人类的活动由认识对象的本质为主,变成为建构认识为主,从而使人的创造能力得到彻底发挥,是人自身的全面解放。

三、这是个生产方式根本变革的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时代

物质生产方式是指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人的需要与自然界的直接存在形式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矛盾,促使人通过劳动生产创造人工产品来满足需要。在劳动中,单个人无法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人们需要联合起来,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7]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必须要借助于人们一定的生产关系来实现,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形式来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核心,决定一个社会的独有面貌和特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因此,要把握一个时代的面貌和发展,就必须研究由该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状况。

在人类社会早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人们满足需要的活动(消费)与生产满足需要的物质产品的活动(生产)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等纷纷独立出来,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出现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0]商人阶级的出现、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的分离,以及生产、流通

与消费领域形成相对封闭板块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信息(数据)缺乏沟通、交流和共享,信息作为一种权力,被生产者独占。由此造成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相对独立、彼此分离,二者之间隔着多重的批发、分销、配送等环节,产品要经过多个中介者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润,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消费,消费也变得功利化和物欲化。

新时代是一个以大数据互联网为基础和平台的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时代。互联网对生产方式的变革最为根本的,就是实现了需求与消费为主导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数字化使互联网成为人类知识、信息积累的宝库,信息日益公开、共享,获得信息日益便捷、低成本。互联网贯通了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横亘在二者之间的中介者、商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有形的市场不断萎缩,生产与消费日益融合为一体。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消费者参与设计并决定生产成为可能和现实。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作为消费者可以不再被动接受生产者生产的产品,而可以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成为生产者。这对人类生产的改进和发展是莫大的推动。消费者的需要是极具个性化的,而互联网释放了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也催生了新的销售模式和生产方式,私人定制、个性化生产,基于市场需求的拉动式、柔性化生产颠覆了传统的生产理念,围绕消费的生产回归到它本来的目的。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延伸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体的互联网系统,生产者可以真正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社会需求情况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情况等,据此来安排生产,从而极大削减了产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生产真正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社会生产的计划性、自觉性愈来愈强,整个社会向着真正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迈进,向着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迈进,因而也是向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迈进。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新时代对社会的生产模式、发展模式、服务模式、组织模式等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要求。从生产模式看,新生产方式要求转变传统的生产主导模式,实现消费主导,回归生产的本来目的。从发展模式看,在互联网新时代,信息(数据)正在成为新经济增长要素,新生产方式要求超越传统的资本驱动生产的弊端,实现以信息创新为驱动的新发展模式。从服务模式看,要利用大数据信息不断去除中介,消除中介商人的剥削,构建体验式、“粉丝”营销与服务模式。从组织模式看,新生产方式要求超越传统的梯形科层制模式,形成网状分工体系,通过小微化自组织模式推进社会化大生产向纵深延展。

四、这是个社会主要矛盾根本转变的时代

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分析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复杂事物作为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是一个动态

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各种矛盾力量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其内部总有一种矛盾处于支配地位,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解决,因而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是主要矛盾,相反就是次要矛盾。辩证法的重点论就是要着重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抓牛鼻子”“打蛇七寸”,着重解决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

我国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最早始于1956年中共八大。中共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集中解决这一矛盾,尽快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路线,表明党的工作已经不是解决阶级矛盾,而是加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后来,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将社会主要矛盾描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沿用了这一表述。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全面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只有集中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有效促进其他社会矛盾的解决。

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源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实现了质的飞跃。表现在: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据联合国统计,2014年底,我国钢、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从恩格尔系数看,2016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标准。中国人民从总体上永远地告别了缺衣少食的物质匮乏年代,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时代,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从追求温饱转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不同于动物,人的需要具有自觉性、社会性、多样性等特点,除了自然物质需要,人还有精神需要:尊重、自我价值实现、艺术欣赏、审美创造等等。当前我

国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总体上实现了温饱,在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必然转向追求超越物质需要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的全面满足。从消费看,人们从主要关注产品功能满足,到追求品质、健康、舒适等的享受;从社会关系看,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社会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的实现,普遍关注个人的价值实现;从自然环境看,人们开始普遍重视生活环境的质量,对绿水、青山、蓝天、碧海提出更高要求。总之,人们开始普遍追求和谐、美丽的新生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正是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伟大转折时刻,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适时、准确的新概括,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标志着我国进入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时代。依据这个判断,我国经济发展将彻底摒弃过去唯 GDP 论,摒弃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实现内涵开发型、环境友好型的自主创新的新模式。依据这个判断,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党的中心任务、战略措施、政策制定、制度设计等等,将摒弃以前的物质匮乏年代的思维方式,转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要通过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正义、平等、公正、民主,感受到社会对每个公民正当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和尊重。同时,还要坚持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既具有城市的高效和便捷又有乡村的宁静与清新的环境,实现人们的“诗意栖居”梦想。

当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不再重要。物质生产永远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当社会普遍实现小康时,物质需求的增长会相对减弱,精神文化需求就会出现一个较大提升,——这个现象只是说明了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的数量是相对有限的,并不是说物质生活达到小康以后,人的物质需求就不重要了,物质生产就可以忽略了。相反,农业作为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实践,永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为满足人的穿、住、用、行等物质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工业、农业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永远不会消失,而其他更高级别的产业如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等,都是在农业、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必将渗透并融入农业和工业生产之中,提升工农业的品质,从而使人们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更舒适、更全面、更自由,更人化。从表面上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用于物质生产的时间越来越少,用于精神生产的时间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抽象地割裂的错觉,这种现象只是说明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日益融合为一体,人满足自身自然需要的方式越来越文化化即人化,而绝不是说物质生产不重要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进入的新时代是一个建立在物质财富的积累达到了质的飞

跃发展基础之上的后物欲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的时代,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改变的全新时代。在新时代,要解决今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需要顺应当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转变思想观念,以互联网为平台和基础,积极推动构建新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首先,就是要超越过去物质匮乏年代的思维方式,换上“后物欲时代”思维方式,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

其次,就是要顺应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根本变革的客观要求,积极推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与大数据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从而促进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尽可能地消除一切公共领域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地消除一切不劳而获的剥削环节,促进生产与消费一体化,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指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其中蕴含着巨大商机,正在创造巨大需求,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也是巨大的。”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物质基础。

最后,就是要借助于大数据互联网平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正义、公平、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大数据互联网平台既便于政府收集民意,也便于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群策群力,实现真正的民主。大数据与公、检、法结合在一起,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视频监控系統已成为办案利器,促进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差和人情关系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在环境治理方面,依据大数据治理环境污染,破解了以往无法解决的难题,使环境保护真正变得可防可控等等。总之,大数据互联网在我国城乡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注释:

- [1] 参见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扉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47页。
- [3] 陈文玲:《关注世界经济新年新趋势》,《经济日报》2017年1月20日。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28日。
- [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363页。
- [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185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